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乙種第十九號

媽 宮 的 寺 廟

馬公市鎮發展與民間宗教變遷之研究

余 光 弘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臺北 南港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B , NO. 19

TEMPLES IN MAKUNG , THE PESCADORE ISLANDS
A CASE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FOLK RELIGION

GUANG-HONG YU

NANKANG ,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198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乙種第十九號

媽 宮 的 寺 廟

國內定價：精裝新臺幣：貳 佰 元
平裝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國外定價：精裝美金：拾 伍 元
平裝美金：拾 元

著 者：余 光 弘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 刷 者：金 賞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自序

故鄉應該是每個人都很熟悉的地方，不會是研究‘奇風異俗’的人類學者‘理想的’研究對象。媽宮是我出生成長的故鄉，一度我自以為在這個小鎮中，我能扮演的角色是報導人而非研究者；但在偶然間注意到一個問題，卻使我憬悟到對故鄉的瞭解並沒有想像中的深，而一草一木都親切熟悉的故鄉也還有許多頗值研究的題材。

1980年我對銅山館和提標館二廟廟名的末字何以是‘館’，而非一般習見的‘宮’、‘殿’、‘府’等發生疑問而開始探索，很快地，從文獻的檢索及耆老的訪談中，不僅追溯出上舉二廟稱‘館’的原因，同時也發現媽宮的寺廟和市鎮的發展之間具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在發表了廟館的初步研究（余光弘與劉肖洵1980）之後，相繼又撰成‘馬公的寺廟與市鎮發展’一文（余光弘1982）。但因二文發表後陸續有新資料進手，從這些新資料的分析，不僅可以看出此二文中所犯的錯誤，也更顯示出媽宮寺廟的研究仍有許多可以發展的空間。

本書的撰寫是以上舉二文為基礎，經過數年更深入的探究及資料累積後所呈現的結果；雖然書中所述與前文略有重複，但主要還是以更新更詳細的資料為主，已經發表過的資料亦經反覆查證，因此前文的錯誤在本書中都盡量予以訂正；更重要的是使用更豐富的資料來說明媽宮都市機能的轉變、市鎮的發展、社會組成群體的更迭、以及民間宗教體系不斷的整合變遷等諸現象之間的關係。

在研究、撰寫及編輯本書的過程中，若非許多鄉親、師長、戚友的熱心協助與指教，本書恐將難以順利出版；在此首先要感謝媽宮的地方父老李度日、吳克文、邵久、林甲寅、林慢益、林麟祥、胡章花、徐明德、高麗水、郭自立、郭自得、陳拱照、陳啓文、陳財旺、許頂額、許等成、許輝星、莊長壽、曾允達、項茂松、項茂榮、鮑頂華、薛光燦、蘇遠智等，他們的報導材料是本書的主要成份之一；澎湖文化中心的伍靜君先生提供的天后宮整建資料、地政事務所的蔡俊哲兄提供的地籍資料、以及馬公戶政事務所提供的戶籍統計，對本研究都有極重要的價值。

業師李亦園教授一向是我論文初稿的嚴格審閱者，前已發表的拙文很多是在其不憚其煩地指點斧正下才逐漸具體成形的；本書的原稿又承蒙亦園師在百忙中過目指正，在此謹致最深的謝意。瞿海源及許木柱二學長曾細讀原稿並惠賜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書能夠更進一步的加以潤飾修正，對於兩位學長的賜教，謹致謝意。當然本書中一定還有若干謬誤尚待修正，這些錯誤的存在是作者應負全責的。

家父余長萬先生不但是主要的報導人，在本研究的初期更不辭辛勞，代為抄錄所有寺廟的碑記（數年後這些碑文方見於出版品中，見蔡平立 1984）；舅父陳克昌先生暨表兄春雄、春仁是報導人及‘線民’，若非他們適時的‘通風報信’，勢必錯失許多觀察重要儀式祭典的機會；田野工作期間全賴弟弟及弟媳光源、翠華對生活起居的照顧；這些協助都是研究期間不可或缺的，在此亦致謝意。

本書的校對、編輯及索引的編排由內人李莉文與李秀娥小姐合力完成，特致謝意；內人除了幫忙編排本書之外，在我長時離家從事田野工作及撰寫本書期間，不僅獨力操持家務，更須應付未滿三歲、精力充沛的幼子，同時仍能不斷給我精神上的支持及鼓勵，本書得以出

版她是最大的幕後功臣。本書封面是由從事美術教育多年的二姊費心設計並親手繪製，書中地圖是好友關華山兄精心繪成，這些精美的圖畫也使本書生色不少，在此謹申謝忱。

本書之電腦排版工作由金賞電腦公司的俞蕙珠小姐負責，工作期間歷經多次之嘗試與失敗，辛苦備嘗；有關排版及印刷諸事亦承何國隆兄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文末之英文摘要部份經好友魏捷茲先生 (James Wilkerson) 之潤飾斧正，在此亦致最深的謝意。

主要田野工作的開支及本書的印刷經費都是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提供的，對於民族所不可或缺的財務支援，謹致最深的謝意。

最後我謹將本書獻給家母陳秋雪女士，在家庭經濟極端困難之際，全賴她的毅力，我們四個姊弟才得以完成中上教育；在勉力從公之餘，她要為我們的學費及在外地就學的生活費奔波及低聲下氣，其間的苦楚絕非含辛茹苦一詞所能形容的；最不幸的是在子女長成後，她卻為腦中風擊倒，在病榻上已無知無覺地挨過一千多個日子，子女的任何成就對她已經毫無意義；雖然如此，我還是要把我的第一本書獻給她，以表示對她無盡的感念。

余 光 弘

1988年10月 於臺北南港

目 錄

自 序.....	i
第一章 導言.....	1
第二章 閩澎所有的公廟.....	25
第三章 清代班兵之伙館廟.....	53
第四章 各甲私有的角頭廟.....	79
第五章 齋堂佛寺鸞堂及其他.....	107
第六章 廟宇的創建興衰與整合.....	127
第七章 結語.....	155
參考書目.....	165
索引.....	171
英文摘要.....	179

圖 表 目 錄

表 1 - 1	清代及日據時期澎湖地區及媽宮市人口統計表 ...	10
表 1 - 2	媽宮市區各里人口增減統計表	19
表 3 - 1	清代戍澎班兵撥調員額變動簡表	59
表 3 - 2	清初澎協左右營班兵隸屬單位分佈表	67
表 5 - 1	媽宮寺廟附設善堂概況表 (1)	120
表 6 - 1	媽宮市內諸廟 7 月普渡日期及贊普戶數	153
圖 4 - 1	媽宮角頭廟祭祀圈與次級地域群體關係之演變	89
圖 6 - 1	媽宮寺廟創建、修建簡略示意圖	129前插頁
地圖 1 - 1	媽宮市街及寺廟分佈圖	25前插頁
地圖 1 - 2	媽宮市日據以後所建寺廟分佈圖	20
地圖 1 - 3	清末媽宮市聚落分佈圖	23
地圖 3 - 1	清初媽宮市內各營戍兵勢力分佈蠡測圖	64

第一章 導言

本書的主題是在記錄媽宮市⁽¹⁾內諸廟宇的興衰存亡史；乍看之下此一題材似無新意，因為媽宮的寺廟雖無專著，但全澎湖區寺廟的歷史記載卻是數量不少，真可謂‘前人之述備矣’；可是細察這些著作的內容，即能發現幾乎千篇一律都是傳抄舊志或舊作，所以雖然量多質卻不精，更遺憾的是許多以訛傳訛的錯誤，經過一再地傳播之後，衆口鑠金，竟被認為是確論、定論。例如：水仙宮的創建者無端地扯上郁永河；澄源堂的建立年代明揭於廟碑中，卻無人細讀碑文，粗枝大葉地把立碑年代做為建堂年代；銅山館、提標館認定的建立年代均遲於實際之時間。這些訛誤之發生在於修志者對於資料之採用全未選擇甄別，舉凡道聽途說街談巷議，均信以為真有聞必錄；因此有關的記載雖然數量極多，對於媽宮寺廟之歷史真象的瞭解卻仍屬有限。

其次一般志書對於媽宮寺廟之記載均採條列式，即各廟的資料分別列舉，彼此互不相涉，當然此種方式並非僅見於澎湖地區的志書，台灣大多數地區的寺廟歷史材料也都是同樣地見樹不見林。

有感於傳統地方志的闕漏，本研究最‘原始’的目的僅在嘗試提供媽宮市衆多廟宇的一部‘信史’，因此不但仔細檢索各廟之歷史記載、廟中所遺之古碑、古匾、古聯、古契，並多方訪問搜集故老口耳相傳的民譚軼聞，更重要的是將此類資料併列對照。在此一研究過程中，非僅各廟的發展史可以獲得較信而有徵的資料，在各種資料的排

(1) ‘媽宮’日據時改稱‘馬公’，沿用至今成為官方文書中的正式稱謂，但當地土著仍使用舊稱‘媽宮’。

比、分析之下，更進一步發現若干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趨勢亦能大略掌握，所以本書的目的乃擴而大之，一方面在為媽宮的寺廟留下翔實可信的紀錄，再則企圖將媽宮寺廟資料做一整體性的觀察，並與其他地區的寺廟資料彼此參證比較，亦即將寺廟置入全貌性、貫時性及同時性的比較脈絡中加以分析，以探索清代以降媽宮市民間宗教的發展、市鎮機能的變遷、與市鎮中社會結構的改變之若干特徵及概略的趨勢。

本書中所要討論的寺廟，一般的媽宮人將之分為‘廟’及‘祠’（或稱廟仔）兩類⁽²⁾，主要的區別在於‘祠’是小廟，例如景福祠、福德祠、靈應祠、朝陽祠等，不過其間的分際並非截然，很難清楚地指出面積多少以下即稱祠，另外的一個區別在於祠之主祀神都是土地公及屬於有應公類的無祀孤魂提昇的低神格之神。因此本書中所謂的寺廟係指“安置神像、神壇及香爐，而一般民衆得自由進出〔參拜〕的建築物”（DeGlopper 1974:46），在此‘民衆得自由進出’是一個須加強調的重點，媽宮市內還有一些歷史頗久的家庭神壇，亦允許民衆進入參拜，但因神壇及神明擺放位置均在私人家宅內，一般民衆要進出其間必須徵得屋主之同意，或至少須經過私宅的其他住居部份，大多數的媽宮人都不會將這類神壇（例如：興善堂、坤儀堂及東鳳宮）視為可以自由參拜的廟，故這類神壇有些雖在官署中已做寺廟登記，仍未列入本研究範圍之內。

以下的討論中是將寺廟視為各種社會群體的中心、表記及榮耀（the center, the emblem, and the pride; Schipper 1977:652），但在

(2) 佛教類僧尼極力反對其寺院被稱為‘廟’，他們堅持的稱呼是‘寺’，但一般民衆仍一律稱之為‘廟’。另外有人亦將澄源堂及太和堂稱為菜堂。

此必須特別指出寺廟是傳統（至少是台灣地區）漢文化的‘基象徵’（key symbol），對於某一個特定社群的成員，其做為信仰中心的主廟，可以激起他們對整個群體的情感，這個群體所代表的所有複雜的理念，亦可經由此一象徵加以整理統合；簡言之，某一群體的守護神廟，即可代表這個群體的整體（Ortner 1973），故在台灣早期的移民社會中，社群雖有同籍、同姓、同業、同居一地等不同的組織原則，幾乎一致性地，每個社群均會以一守護神做為群體的象徵，當社群的人力、財力有相當的發展後，常建立其專屬之祠廟以崇奉其守護神⁽³⁾。

因此從數量上來看，市鎮內常因擁有各種基於不同原則組成的社群，而由不同社群建立許多各式的廟宇，鄉村地區的社群組成地緣常是唯一的因素，或許有些同姓或同籍群體的存在，但此種群體最後常會融入地緣的村落中，共擁一守護神共建一村廟以為象徵。故市鎮在先天上就有產生比鄉村較多廟宇的可能性。其次廟宇的建築物在無人為的蓄意破壞狀況下，能夠存在的時間極長，並且一旦在某一特定基地建成後，不可能隨意搬動，因此一個社群的離去或消亡，並不意味著其原有之象徵亦在當地消失；相反地，其原有的廟仍會長期屹立，為其曾經存在做一見證。雖說寺廟建築的壽命極長，若長期的忽視未加維護，其存在亦有一定的期限，故支持群體的消散解體對一座廟宇的存亡絕續產生極大的考驗，如果在其存續期間無法得到其他群體的

(3) 以下的討論中為行文方便起見，常見‘神’及‘廟’之區別加以忽略，雖然中國人所敬拜的神祇數目繁多，各神也各擁神通，彼此絕不相同，事實上，一旦一尊神像（不論有無專廟）被奉為一個群體的象徵後，其意義常變得極為一致；DeGlopper 的看法很值得注意：“It seem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re be a temple which is a neighborhood temple, than it is there be a particular deity in that temple” (1974:54)。

支持認同，則在時間的無情侵蝕下，必將步上滅亡之路；反之若能獲得新興群體之‘垂青’，採用做為其象徵，而加整修維護，則該廟即可起死回生，繼續與其代表的新群體共存共榮。

市鎮中由許多質異量多的社會群體組成，以及做為社群象徵的寺廟能被不同的社群反覆使用的兩個因素之互動，使得市鎮中的一部寺廟歷史不僅牽涉該地的宗教現象，各個寺廟的興衰存亡，也同時錄下市鎮中曾經存在的社群與其在當地的榮枯滄桑，以及相伴於社會組成份子的變異之市鎮各類政治、軍事、經濟功能的改變。媽宮市寺廟的興衰之宗教性及其他非宗教因素的探討，將在下文中逐漸呈現。

本書除前言及結語外共分為五章，每一章各討論一個特別範疇的廟宇，這些不同範疇的廟宇在媽宮出現的順序，亦概略地與各章安排的順序相符。第二章敘述的是闔澎所有的公廟，這些廟宇的前身大都是清廷政府以公帑維護整修及按時行祭的祀典廟，或是清廷官吏出資建立、維持的官方神教祠祀；第三章所述的清兵伙館廟是媽宮地區極特殊的一種廟宇，即由清廷綠營駐澎班兵所組成的伙館轉變成的廟，這類廟宇除澎湖外，僅在‘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清代三大港口還有遺存，但以目前所知似乎數量最多的是在媽宮，留存至今的廟館亦推媽宮最多，由清兵伙館肇始，至今仍能倖存，其間各館的宗教或社會功能均經數次的改變，對本書提出的論點提供極佳的例證；第四章的主題是角頭廟（媽宮稱甲頭廟），涉及各角頭領域的變化，角頭意識及角頭廟的創立，以及各角頭廟的管理組織對其廟的興衰之影響；第五章涵蓋的並非一個單一範疇，除佛寺外，尚包括鸞堂、齋堂以及前面諸章節難以容納之各類小廟，這些不同的宗教組織、機構（鸞堂、齋堂及佛寺）一方面反映出媽宮的某些社會政治經濟變遷，同時亦將某些新的宗教元素引入民間宗教體系之中；第六章即總括前面數章的資

料，將所有媽宮的寺廟併列，做貫時性及共時性的檢討，並對寺廟之興衰滄桑的宗教性及社會性因素做一統合的說明。

在進入正文之前，須對澎湖及媽宮的概況做一簡略介紹。澎湖群島位於台灣海峽之中，屬島百餘散處大洋之中⁽⁴⁾，是台灣地區漢人最早定居拓殖的領域，根據最新考古證據顯示：“漢人拓殖澎湖群島的最早年代，最遲當不晚過北宋，極可能是在唐末或唐宋之間，其時，來自大陸東南沿海的漁民，把澎湖當作是一個臨時性的漁業基地或休憩地；到了南宋時，才開始有漢人在澎湖聚居，他們以捕魚採貝，畜養和耕種為生，並且與大陸沿海交易有無”（臧振華 1987:86-7）。

但是在澎湖長久的開發歷史中卻一直限於群島本身特殊的生態條件，無法在經濟、人口等方面有較大的發展。澎湖最不利的生態條件在於‘風’，俗諺有云‘澎湖出狂風’，胡建偉的‘澎湖紀略’更有明白的指陳：“澎湖風信不惟與內地不同，亦與他海迥異。周歲獨春夏風信稍平，可以種植。然有風之日，已十居其五。一交秋分直出冬底，則無日無風。其不沸海覆舟，斯亦幸矣”（1771:5）。陳正祥的‘澎湖縣誌’有更詳細並附有數據的說明：

澎湖向以多風著名，此為當地氣候上最大的特徵，也是產業上最大的缺點。馬公之年平均風速為每秒6.4 公尺；東北季風期內，風速尤大，十二月之平均風速竟達每秒9.1 公尺。冬期之澎湖群島，幾乎每日皆刮暴風（風速達每秒10公尺者）；馬公全年之暴風日數，多至137 天。冬期自十月至翌年三月，馬公之平均最大風速為每秒17公尺，極端最大風速為每秒34.3 公尺；暴風日數為109 天，平均每1.7 天刮暴風一天…夏期南來季風，風速較冬季為小；馬公七月之平均風速為每秒3.8 公尺。但夏期自六月以至十月，常有颱風來

(4) 一般皆謂澎湖有64島，其確數當依‘島嶼’之不同認定標準而有出入。據從事實地勘察研究多年的洪瑞全先生面告，澎湖島嶼數實際逾百。

襲。在1897-1950年之間，襲擊澎湖群島之顯著颱風共計16次....
(1955:15)

陳正祥又提及夏季從台灣海峽北上之颱風對澎湖常造成極嚴重之傷害，例如1920年 7月24日的颱風最大風速每秒38.3公尺，而1940年 9月30日的颱風最大風速更達每秒40.3公尺。1986年 8月的韋恩颱風亦經同樣路徑，毀屋沉船無數，澎人至今每一提及仍心有餘悸。

澎湖的狂風肆虐，使得耕漁及商販貿易之利降至最低；由於澎湖的年雨量僅約1000公厘，但“因為多風之故，蒸發量極大，年平均達1865 公厘，幾為年平均雨量的一倍…冬期半年，地表土壤因水份缺乏，以致非常乾燥，每刮大風，必使遍野塵土飛揚；土壤表層之細沙，盡隨風而去，地力乃愈演愈瘠”（上引書：17）；多風少雨表土淺薄不易保持養分，對一般作物而論此種生長環境是極不利的，故澎湖的主要作物是耐旱性的高粱、玉米、花生、地瓜等。但‘風’對澎湖的農作物仍有其他的破壞性，由於冬季強風不斷地吹襲，植物體不斷受壓就會產生大量乙烯誘發休眠甚至死亡，因此澎湖的農地大都均須投入大量勞力建起防風牆；不過在冬季季風強勁或是夏季颱風猛烈時，強風常從海中吹起海水降落於作物之上，常使辛苦經營的作物旦夕之間傷亡殆盡，這就是澎湖農民聞之色變的‘鹹雨’。植物之生長環境不佳，生長季節短，澎湖之農業自然難以發展，大規模的畜牧業也因牧草、飼料的無法供應而同樣難以發展。

在討論澎湖的漁業時，陳正祥有以下的看法（上引書1955:62）：

漁業為澎湖群島惟一較有希望的生產事業，附近有相當優良而廣大的漁場，所產魚類也不少，估計超過300 種，成為島民比較保險的生存資源。但澎湖漁業亦有其天然的限制，第一是冬季東北風太強，幾乎有半年時間，小船不能出海捕魚；而夏半年又有颱風的威脅。第二是夏季氣候熱濕，捕獲之魚不易保藏；而海岸多成陡崖或沙

灘，又不利于晒鹽；目前澎湖所需之鹽，皆來自臺灣。這在製冰事業未發達，而人民普遍窮困的漁區，不能不算是一個大缺點。

雖然近年來由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漁船都已採用機械為動力，氣象預報的準確度亦逐漸提高，船隻冷凍設備及一般的冷藏技術及設備也多有改善，自然條件對漁業的限制略為減輕，但在20-30年以前，澎湖雖有良好漁場，漁業的發展確是受到陳著所論二因素之極大限制。基本生產力的不振對昔時澎湖地區發展所造成的障礙是極明顯的，‘澎湖廳志’內曰：

宇內瘠苦之區，至澎湖而歎為僅有。其地海濱斥鹵，僅產雜糧，中稔猶恐不給；一遇鹹雨則顆粒不留，即牛畜亦難以存濟，其窮荒海角之民輾轉溝洫者，更不堪設想…其漁者值颶颶時作，仍不得採捕；則所謂以海為田者，究非確論。小民生計無聊，年復一年，惴惴焉幾俸鹹雨不作，以苟延歲月，救死且不暇，何暇興於行哉（林豪1893:349-50）？

清末的情況是如此⁽⁵⁾，宋、元、明歷代澎湖的情況或許不致於更惡劣，至少也不會更佳；因此在澎湖開拓的初期，直到明末台灣本島開始有較具規模的漢人移殖社區出現之前，澎湖一直被視為疆域最外緣的海外孤島，並未受到注意。但自從漢人開始殖民台灣後，澎湖的地位乃從邊陲荒陬一躍成為聯接閩台的中繼站，在昔時航海術及航具不甚精良的時候，閩台之間的交通是以澎湖做為定向點，以及遇風暫時收泊之所⁽⁶⁾，胡建偉的‘澎湖紀略’中有載：

(5) 澎湖地區求生不易的慘況自蔣鑄的‘澎湖續篇’（1832）起即多有記載，到1955年時陳正祥做‘澎湖縣誌’時仍無太大改善，見陳著（1955:57-61）。

(6) 清初之前航行閩台之間的船隻可能以澎湖為中途站，在此稍停留一二日再啟行抵目的地，郁永河到台採硫即曾在澎湖停留二宿一日（見郁永河1700:4-8）。

船由浯嶼〔今之金門〕或大嶼門放洋，用羅經向巽已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澎湖西嶼、貓嶼、花嶼可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而諸嶼不見，定失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澎湖至台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可以泊舟；若為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1771:16)

不過澎湖的地位並不只在航運交通上有其重要性，最重要的還是其控制台灣的樞紐地位，以及中國大陸東南海疆的屏障；從荷蘭人侵台開始，台灣本島主權的易手，都是以澎湖的攻防或佔領為決定性之役；鄭成功進軍鹿耳門之前先取澎湖；施琅平台的決戰場在澎湖海，劉國軒在海戰失利澎湖一失即勸鄭氏政權降清；至中法戰役法人亦先在澎湖登陸，以威脅清廷之東南海防；甲午戰後台澎割予日人，其侵台之首站亦在澎湖。

清廷領台之初對澎湖並不重視，一度曾有棄守的考慮，後賴施琅之力爭方才保留，不過清政府對澎湖起初是採取較消極的態度，不久澎湖的軍事戰略地位即日益突顯，清廷對其觀感為之大變，胡建偉曾說：“澎湖屹峙巨浸之中，幅員不過百里；而島嶼森列，巨細相間，砂線迴環，坡隴相望，古稱長江天塹不足以喻其險也。昔鄭成功竊之而喘延三世，朱一貴失之而六日可平”（1771：14）。除施鄭關鍵性的海戰外，清廷也意識到朱一貴之役雖然震動全台，卻因澎湖未失，可以為清廷平台部隊集結轉運之兵站，終能迅速擊潰朱部收復台灣，故康熙60年朱役亂平後，有人竟提議台灣總兵移鎮澎湖，而在台灣僅設副將，後來此議雖未被採行，卻可看出澎湖戰略地位之被看重。所以清代台灣營制設總兵官，統一鎮軍力約萬人防守全台，但其中的五分之一（2,000人）卻歸澎湖水師協之副將統領以防禦澎湖。媽宮即是清廷在澎湖所營建的軍事要塞及主要水師據點，後來更逐步演化成全澎之政經文教中心。